

“镉大米”触动利益“多米诺”

木须虫 职员

湖南攸县及衡东县4个米厂所产大米镉超标,食安办和质监局互“踢皮球”,均未披露大米镉超标情况。一位湖南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官员表示,大米重金属超标全国都有,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也早已存在,但湖南是农业大省、产粮大省,过于炒作湖南大米镉超标之事,对农业经济影响很大。(5月21日《每日经济新闻》)

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不是新闻,有关镉大米因广东食药部门的一次抽检,而再度成为关注的对象,消费者因此对问题大米有了更深的了解,却不幸又抽走了几分食品安全的信任。事实上,大米重金属超标并非种植和加工过程中的人为因素,而是环境因素的影响。因此,除非产地不再种植,否则,这个问题将永远

存在。并且,“镉大米”作为一个样本,完全可以抽象成一根长长的利益链条,这里面包含有产地农民、地方政府维护稳定、流通环节的供需、品牌形象等等,在这些利益的对面则是消费者的健康权益。

权益与利益的博弈,从根本上考验监管的抉择,从而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。诸如,广东药食监管部门何以会在舆论的三催四请之下,象挤牙膏一样的公布检测超标的单位、生产企业和品牌,而流通环节中被检测出的超标大米,如何又通过其他渠道流入市场,更重要的是产地检测缘何形同虚设?

事实上,这些并不奇怪,地方的经济利益早已绑架了地方的监管,不止是“镉大米”,还有诸如农药残留、激素添加,在很多地方是公开的秘密,生产的人不吃,监管的部门熟视无睹,一者监管的机制

本就有问题,“九龙治水”的格局,造成“牛栏关猫”的局面,给了责任开脱的机会;二者诚然也管不好,法不责众不说,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类似的问题,在流通领域同样存在。

比如,这个“镉大米”由来已久,是不是湖南就不种了?果真如此,当地的农民何以为生?即便是种植转型,又未必能够保证其他的农产品就不会超标。根本之策还是有效治理环境污染,以及改变生产的方式。

“镉大米”触动利益“多米诺”,它既具个案特征,即环境污染传递出来的多方利益受损,又具普遍特征,扭曲的利益链条束缚了监管的手脚。可见,食品安全并非单纯的监管问题,根源还是经济以及由此伴生的市场秩序问题。食品有毒,监管吃药,虽然理所当然,但只治标不治本。

管不了、管不好,更应从利益链条的重构上做文章,一方面是农业加快转型,走集约化、现代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生产的道路,有效改变松散、低效、无序的千家万户小农业的格局,减少生产环节庞大的主体;另一方面是强化经营者品质责任,改变流通方式,减少流通市场主体,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。“镉大

米”带来的警示,既要修复大米无害的自然生态,更要培育安全品质的经济生态。



保健品“打非”,也别忘了“打正”

黄齐超 教师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今日宣布,决定5月初至9月底,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该专项行动,重点打击保健食品非法生产、非法经营、非法添加、非法宣传等问题。目前,保健食品非法生产、非法经营、非法添加、非法宣传等问题依然突出,在某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。此次专项行动采取摸底排查、突击检查、公开曝光的方式,以重点产品、重点企业、重点区域、重点案件为突破口,对保健食品市场进行专项整治、惩处和规范。(5月16日中国新闻网)

“四非”保健品害人不浅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打击“四非”活动,是正常的履行职责,理所应当。不过,打击“四非”保健品,确保消费者正确购买、安全食用保健品,不能仅仅盯着非法保

健品,还应严查那些所谓的“合法正统”的保健品。因为一些所谓的“正统”保健品,也会干起“四非”的勾当。

在“四非”保健品中,最让患者痛恨的莫过于非法宣传了。保健品的非法宣传,意在混淆药品和保健品的区别,淡化甚至掩盖保健品的“保健”功能,而突出它并不具备的功能——医疗。有的保健品还将子虚乌有的疗效吹嘘得天花乱坠,蒙骗患病的消费者。不过,他们招摇撞骗必须有一个基础,那就是具有符合国家的食、卫部门标准的相关证件。这就是说,某些厂家的商品取得了保健品的许可证书,这只是表示它具备了保健品的资质,而不是医疗药品。

事实上,随着消费者辨别意识的增强和消费环境的改善,那些没有任何证书的“保健品”,根本就不具备行骗的资格。在给消费者带来欺骗和伤害的保健品中,很

多都是取得保健品资质的“合法”保健品。一些不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,花费巨资公关,树立良好形象。但在“转正”之后,为了谋取更大的私利,就不再遵守保健品的相关要求,变成了“合法”掩护下的“非法”保健品。这些“合法”保健品,更具有隐蔽的欺骗性,职能部门不可不防。

保健品不可以代替药品。一种新药品的面市,必须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,并通过国家药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;保健品没有规定治疗的作用,不需要经过临床验证,仅仅检验污染物、细菌等卫生指标,合格就可以上市销售。低门槛的准入制,给保健品市场的混乱提供了土壤,相关部门一定要肩负起监督和监管的职能,把这个问题正视而且重视起来。否则,轰轰烈烈的打击保健品“四非”活动,就像是保健品一样,只是忽悠一阵子,不具什么疗效。

借鉴“蔬菜实名制”中的精细监管

雷泓霖 教育工作者

日本超市售卖的水果蔬菜都有属于自己的“身份证”,产品的名称、产地、商户号、采摘时间、土壤情况等信息一目了然,更有意思的是,每一样蔬果还都有名字,像木崎根西红柿,白根明俊生菜。日本百姓对这件事情持欢迎态度,有的顾客到了店里以后,会跟店员指名购买哪个生产者的蔬菜水果;很多饭店、食品加工企业,都主动要求把食品贴上这些人的名字。(5月21日中国广播网)

日本的食品监管,可真是达到了精细化水平。这个精细化细节至少向我们传达了这样几个关键信息:其一,政府对食品的监管已提升到了“事无巨细,绝不放过”的程度,政府动用精细化监管力量、监管网络,竭尽所能为民众提供安全、健康、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。

其二,食品生产者的安全生产和健康生产的意识得到了强化、固化。生产者的名字都成了食品安全重要信息,生产者事事、时时都要接受政府和消费者监督,安全积极性和紧迫感,自然就能得到很大提高。作为安全的重要保障——生产者,不敢造假、不敢违规,才能让食品生产环节保持最大程度的安全,整体提升食品安全效应。

其三,公众的安全监督责任和公

共监督力量得到了强化。食品安全监督如此轻松简单,打个电话就能举报、报告食品不安全的信息,公众的公共监督也就能得到巨大提高。群众监督组成了铜墙铁壁,就能营造出安全、健康的食品生产和销售环境。

还是会想到我们的食品监督,虽然也有肉菜追溯体系等试点,更多地方的食品监管,仍然太“粗放”,多是出了问题,才进行重罚,这种“救火式的监管”、“被动监管”,因为未能对安全隐患进行及时遏制和堵截,监管漏洞多多,监管效果总是不够理想,“食品炸弹”不断出现。

因为缺乏详细生产信息,出了问题想要迅速查出生产者的个人信息,根本不可能。因此,更多生产者的安全意识和责任,变得非常懈怠,甚至为了利润,铤而走险,丧心病狂。

正因为“监管很粗放”,公民个人举报各种食品不安全信息不够方便,非常困难,甚至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,费尽周折,很多公民就放弃了这种公共监管责任。食品监管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自己在“做”,监管效率也就降低很多。

应多学学日本的“蔬菜水果实名制”,让精细监管、实名制和食品安全紧密联系,调动生产者、消费者以及职能部门的监管积极性,将食品安全生产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。

打车软件动了谁的“奶酪”

江德斌 自由撰稿人

手机下载免费打车软件,轻点屏幕就能成功打到一辆车。但近日,深圳多名出租车司机反映称,手机打车软件被主管部门因担心影响营运秩序而紧急“叫停”,并对此表示惋惜。突如其来的“卸载令”,给正在蒸蒸日上的手机软件行业扔了一颗“重磅炸弹”,令不少专业做打车软件的公司苦不堪言。(据5月22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打车软件是在智能手机上所使用的应用软件,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市场推广阶段,而随着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,打车软件的装机量也越来越大,并且受到市民和司机的普遍欢迎。目前打车软件都没有盈利模式,仍在全力拓荒抢占市场份额,而出租车主管部门紧急“叫停”,要求司机必须“卸载”,否则将视为违章予以处罚,此举犹如晴天霹雳,截断了打车软件的发展之路。

深圳市交管局发布“卸载令”的理由,乃是出于担心打车软件影响营运秩序,不免令人纳闷。打车软件的市场定位非常明确,就是做市民与司机之间的信息桥梁,通过软件平台将二者的供需联系在一起,从而实现互动预约打车。可见,打车软件是顺应市场潮流而生,既可缓解市民打车难、交通拥堵的问题,又可降低出租车的空载率,增加

司机收入,提高运营效率,对环保节能也有贡献,可谓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。

然而,如此叫好又叫座的打车软件,却遭到出租车主管部门的横加干涉,以莫须有的理由强制司机卸载,简直让人无法理解。打车软件动了谁的“奶酪”?

打车软件是科技发展的产物,也是信息时代的趋势,如果能够持续良性发展下去,将会对行业起到颠覆性的效果。如同微信的快速崛起,触动了电信运营商的传统业务一样,打车软件的诞生,也使得司机可以绕过出租车电调平台,直接跟乘客沟通预约业务,从而导致电调业务受到冲击,并增加了行业监管难度。

至于因打车软件引发乘客与司机的纠纷,其实并不可怕,只要行业监管部门依法协调和处罚,就可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,根本不会有添乱之说。显然,主管部门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布“卸载令”,不仅难以控制司机私下使用打车软件的行为,还侵犯了市民的自由选择权,违背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竞争,更重要的是堵塞科技变革的道路,实则是弊大于利的做法。

因此,主管部门不应应用行政权力干涉打车软件的市场化竞争,应该尊重市场和科技发展,积极研究利用打车软件,促使其在法律界限内合理运行。

不宜把民间偏方一律认定为假药

李英锋 律师

4月8日,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之后,倪海清等来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的一审判决:倪海清因生产、销售假药罪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倪海清是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名江湖郎中,出身农民,小学文化,没有行医资格。倪海清称,十多年前,自己偶然获得了别人的祖传秘方,在此基础上,研制出了一种治疗晚期癌症的中草药秘方,救治了数百晚期癌症病人。2009年,他成立了海清民间草药研究所,之后获得了肿瘤内服中草药片剂国家发明专利。但其研制的中草药片剂并无生产许可证及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文号,在法律意义上,这的确是假药。(5月21日新华网)

倪海清的中草药秘方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,也获得了不少晚期癌症病人的认可,但却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。实际上,因出售偏方药品或按偏方治病而获罪的人还大有人在,他们的偏方也几乎都处于一种被民间普遍认可而遭法律否

定的矛盾状态,这种矛盾状态注定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,也会引发人们对于“民间偏方”的法律定位的思考。

“民间偏方”,顾名思义是指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同意生产销售,不是正统的药方,其来源不为人知,也不见历代的药学典籍记载,只是在民间流传。“民间偏方”的一大特点是其疗效的不确定性,它可能对于防治某些疾病有一定的效用,甚至能治愈某些疑难杂症,但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副作用。民间偏方因其用药简单、价廉、疗效独特而受百姓的欢迎,在民间有“偏方治大病”和“小小偏方,气死名医”的说法。“民间偏方”在其民间流传的特定环境中,往往被解读成“秘方”。“民间偏方”虽然不具有正规药品的身份,但种类繁多,五花八门,在民间广泛存在,颇有市场,很多人都曾使用过“民间偏方”,都曾因“民间偏方”受益。

笔者以为,以未获得批准文号来否定“民间偏方”是偏颇的,我们不能把“民间偏方”一律认定为假药。以情理来衡量,“民间偏方”虽然存在着不确定性、不规范

性,但大都已经存在几十年、几百年甚至更长,且覆盖了一定地域和人群,可以说,“民间偏方”几乎就成为了一种传统的医药文化。显然,全盘否定这种传统是不现实的,用法律取缔所有“民间偏方”、制裁所有“郎中”也是不现实的。而如果法律只取締少数“民间偏方”,只制裁少数“郎中”,则会伤害法治的公平。以法理来衡量,“民间偏方”往往都未取得批准文号,因而不宜用是否有批准文号来作为判断“民间偏方”是否为假药的依据。另外,尽管缺乏权威的鉴定结论,但很多“民间偏方”的效用是客观存在的,也就是说,很多“民间偏方”是有益的,或者是利大于弊的,且使用“民间偏方”的“郎中”往往都不具备明知是假药而销售使用假药的故意。所以,使用销售无批准文号的“民间偏方”药品欠缺生产销售假罪的主客观要件,定罪是非常牵强的。

诚然,使用销售无批准文号的“民间偏方”是违法的,但我们应该首选行政手段进行规范,而不宜脱离实际盲目偏激地用刑罚手段进行打击。

拆除“亚洲最大游乐园”谁该反思

张枫逸 公务员

京藏高速昌平南口出口向北,原本曾规划为亚洲最大的沃德兰游乐园,因故停工,在荒废了十几年后,这座平静的童话城堡终于又迎来了“人气”。原址将改建大型购物中心。(5月20日《北京晨报》)

游乐园拆除改建购物中心,对于已然沦为“鬼城”的沃德兰游乐园来说,也算是涅槃重生。不过,历史的一页不能就这样轻轻翻过。宏伟规划中途夭折,停工烂尾一晃14载,所留下的不只是孩子们心中那个夭折的梦想、不会兑现的承诺,更有巨额的资金浪费、大量的土地闲置,以及再也追不回的发展机遇。

拆除“亚洲最大游乐园”谁该反思?显然,项目的投资方首当其冲。正如著名旅游社会学者、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博士所言,“缺乏专业背

景、选址与消费需求不吻合、时机有点超前,这三大软肋造就了这座城堡废墟”。不过,对于当地政府来说,更要为引进项目失败深刻反思。

在利益诱惑面前,资本容易冲动,率性而为,但政府必须保持一份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冷静克制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毕竟,投资者花的是自己的钱,经得起风险和折腾;政府土地出让、税收减免等配套政策,花的是公帑,事关地方发展大计,不能“大不了从头再来”。一个项目的夭折,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沉没成本,更有看不见的机会成本。试想,如果不是沃德兰游乐园白白荒在这里,12304公顷土地,14年时间,又能创造出多少财富,给公众带来多少欢乐?

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,全国掀起一场主题公园热,至今已累计开发主题公园式旅游点2500多个,但非常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。当年的“西游记宫”,早已门庭

冷落,成为笑柄。投资八亿元的苏州福祿贝尔乐园,开园仅一年就因游客稀落难以支撑,最终关门。对此,深圳华侨城集团总裁任克雷一语中的,“政府热情高涨,难免带某种色彩的长官意志。一些地方拿当地天然的旅游景区搞主题公园,原始旅游资源的破坏是对主题公园的极大讽刺。”

究其原因,招商引资机制缺陷难辞其咎。目前,各地在招商引资时大都只看重表面上的数字,按照引资规模论功行赏,缺乏对项目可行性的科学研判。一些官员一味好大喜功,盲目招商,导致不少项目成为烂尾工程。

亚洲最大游乐园沦为“鬼城”被迫拆除的教训必须汲取。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招商引资绩效考核机制,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对引资项目严格把关,改变“只问播种不问收成”的局面,避免宝贵的发展机遇再被拿来肆意挥霍。